

川大史学·历史文献学卷

川大史学

历史文献学

卷

彭裕商 舒大刚 主编
张尚英 副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历史文献学 

川大史学

彭裕商 舒大刚 主编 张尚英 副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庄 剑 张尚英(特邀)
责任校对:郭 齐(特邀) 李文泽(特邀) 黄文龙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大史学·历史文献学卷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8
ISBN 7-5614-3495-2

I. 川... II. 四... III. ①史学-文集②史籍-文献学-文集 IV. ①K0-53②G257.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0070 号

书名 川大史学·历史文献学卷

主 编	彭裕商 舒大刚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180.25
字 数	423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 ~ 1 300 册
定 价	450.00 元(全七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川大史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罗志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冉光荣	石 硕	孙锦泉	刘复生
任新建	何一民	何 平	罗志田	陈廷湘
杨天宏	徐亮工	郭 齐	彭裕商	舒大刚
蔡崇榜	霍 巍			

《川大史学》工作委员会

组 长：王挺之

副组长：孙锦泉、舒大刚（常务）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石应平	孙锦泉	李德英	陈廷湘
杨秀春	徐开来	舒大刚	鲍成志	霍 巍

秘 书：辛 旭

序

历史学是四川大学的优势学科，也是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在1902年开设的四川高等学堂中，即要求学生入校先学习包括外国历史在内的公共科。1910年创办的四川存古学堂中，史学与经学、词章并列，1918年改名为历史科。1924年国立成都大学正式组建了史学系，是川大历史上最早设立的10个系之一。

百余年来，张森楷、何鲁之、刘挾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激、丁山、陈衡哲、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吴天墀、胡鉴民、任乃强、杨人楩、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闻宥、常乃德、钱穆、缪钺、蒙思明、萧公权、卢剑波、谭英华、萧一山、吴廷璆、杨东莼、周传儒、柳诒徵、韩儒林等众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先后在此设帐授学，为川大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学术繁荣的基础是不同学术风格的交流融会。回顾川大的史学发展史，至少可以辨识出三种主要的学术流派。首先是近代“蜀学”，尤其是其中的“文史之学”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在川大史学系任教的近代蜀学传人包括张森楷、叶秉诚、祝同曾、蒙文通等，在史学系之外则有龚道耕、刘咸炘、庞石帚等。在治学取向上，他们多重视古经、正史等基本典籍的训练，崇尚博通的治学取向，留意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新史学重视新材料扩充、重视问题意识等取向不

无距离。不过，这些学人也多少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具体情形又随个人和时代不同）。

其次是一批基本为 20 世纪中国新史学所包纳而又与主流有所疏离的学人，包括何鲁之、刘掇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激等。他们或是留学生（多为留法者），或在国内受到较为完整的史学训练（多出自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在文化观念上，他们不赞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对主流派新史学不无批评，主张结合传统与现代，而思想资源则更多地来自西学。他们之中不少人热衷于引介欧、美史学新理论，如李思纯翻译的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史学观念上，他们强调过去与现在并非渺不相涉，不主张将历史事实做孤立考察，而更注重其连贯性；同时，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对“问题”的解决，而尤其体现为对现实的启示意义。用何鲁之的话说，就是侧重“史学智识”，而非“历史整理”。

上述两批学者在文化态度、史学意义的认知上都颇有同调之处，与其时在国内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史学有着较大差异。他们的学术取向对后者不无纠偏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川大史学的影响力。

自 30 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抗战以后，一批主流派新史家进入川大，对史学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川大史学灌注了新的活力，也推动了川大史学地位的迅速提升。

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是这一学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在徐中舒的一手培养下，古文字学和先秦史在川大生根结果，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地位。在考古学方面，田野调查与发掘之风兴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冯汉骥的提议和领导下，川大史学系

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四川文物调查、三星堆、汶川石棺墓和前蜀王建墓的发掘等多项工作。

在注重实地调查风气的影响下，一批新的学术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也日益受到重视。30年代末，冯汉骥两次前往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考察羌族资料。40年代初，胡鉴民对羌族、苗族等民族进行了调查。1946年，任乃强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在川大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出版了《康藏研究月刊》，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极大声誉。

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成为川大史学的一大特色。40年代初，川大史地系表示，“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形殊异，各校各具特色，如地方及专题研究，皆当因时、因地、因人而设置其最适宜之选修课（如川大因特殊环境与需要，即设有‘西南民族及其文化’一学程，定为三、四年级选科），庶能发展特长，有益实用。”随着徐中舒、蒙文通、缪钺等学者先后加入到巴蜀史的研究中，这一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地方史，都共同指向对地理的关注并形成川大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早在1927年，徐中舒就将传统学人视为一脉承继的殷、周相代看作两个不同民族的斗争。同年，蒙文通也发表了其成名作《古史甄微》，提出了有名的上古民族“三系说”。任乃强转入民族学，也是由地理起步。1941年，史学系正式改名史地系。虽然1947年史、地系分家，但对时、空加以综合研究的学术取向则一直延续至今。

就学术建制而言，今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历史学科。华大学者在中国边疆研究、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有独到之长，学术风格更近于主流派新史家。

华大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注重机构建设和“集众研究”，其中，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大学博物馆等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另外，跨学科研究、注重边缘和底层文化均是其特色之一。

华大历史学科早期的领导者主要是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等外国学者。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开始取代了他们的地位。1942年，“华西边疆研究所”成立，由李安宅负实际责任，研究所成员有郑象铨、任乃强、于式玉等。由于成绩突出，仅仅成立一两年的时间，研究所就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1943年年鉴》。1941年，博物馆馆长一职由郑德坤接任。他与林名均、梁钊韬、苏立文、宋蜀青、宋蜀华等学者一道，继续推进博物馆建设，组织考古发掘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巴蜀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拉开序幕。华大历史学科全部并入川大，奠定了此后五十多年直到今天川大史学的基本格局。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等学术前辈的引导下，川大史学研究形成了既注重新材料的搜集运用和实地调研，又注重基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注重专业化的“问题意识”，又注重“通识”眼光的学术特色。

20世纪50年代以后，川大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古文字学、地方史、考古学、民族史、西南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等传统优势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度成为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1981年颁布的首批博士点中，川大历史系就有中国古代史、考古学两个专业入选。与此同时，一批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近现代

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城市史、世界上古中古史、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等也逐渐得到开拓，有的已跃居国内学界之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先后被授予“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5年）、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000年）、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2001），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2006年是四川大学建校110周年。为了庆祝这一盛事，总结100多年来的办学与科研成就，推动学术的新发展，在学校的统筹规划下，我们特决定出版一套15卷本的《川大史学》丛书，分为“大师卷”和“专业卷”两个序列。“大师卷”中收录了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李思纯、任乃强六位先生的著作，代表了川大史学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最高成就。应该说，长期在川大历史系工作而成就足以当得上“大师”之名的不止这六位先生，但这次由于时间仓促，不及为他们一一编辑专集，希望以后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专业卷”按照二级（或三级）学科分卷，尽可能地收录在川大工作过的学者的论文。其中既有已经享誉学界的名家，也有“才露尖尖角”的小荷。因此，文章的质量必定各有高下、参差不齐，但对于每一个曾经和正在为川大史学的建设付出热情与心血的学者，能够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应该说也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历史文化学院

2006. 7

前 言

历史文献研究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主体风格，所以中国传统学术史大而言之就是一部历史文献研究史。历史文献研究以传统的经书注解、史书训释为典型样式，考证、校勘、编纂、辨伪、辑佚等为主要研究方式，代有硕果，世不乏人，18世纪至19世纪的清代乾嘉时期达于顶峰。之后，中国学术的转型促使历史文献研究从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降格为一般的甚至是基础的学术研究，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考古学等新学科的发展，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应用，今天的历史文献研究在方法与内涵上都较以前有所突破。

四川大学向来重视历史文献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其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有关。四川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锦江书院与创办于清光绪元年（1875）的尊经书院，这两所书院尤其是尊经书院的优良传统对后来的四川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张之洞创办的尊经书院，摒弃陈腐的八股时文，反对空疏繁琐的学风、文风，注重对中国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提倡通经学古，成为近代蜀学的发源地之一。尊经书院邀请专精《公羊春秋》的王闿运为主讲前后长达八年，培养了大批长于经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儒学文献研究的人才。从其刊刻的学员作品集《蜀秀集》、《尊经书院初集》、《尊经书院二集》、《尊经书院三集》来看，当时尊经书院的学生对六经皆有研究，且考证严谨、详实。廖平、吴之英、宋育仁、杨锐等人为尊

经书院学生中的佼佼者，廖平对《春秋》三传及经今古文问题的研究、吴之英对三《礼》及《公羊春秋》的研究、宋育仁对三《礼》的研究可谓成绩卓著，影响广远。他们几人后来又都成为尊经书院或者四川大学的教员或山长（或校长），将重视儒学文献研究的传统延续下来。经学大师廖平的经学思想启迪了蒙文通先生的学术研究就是明显的一例。除儒学文献外，尊经书院也重视史学文献的研究，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就著有《隋史补遗》、《晋书注》等著作。

秉承尊经书院的优良传统，四川大学各个时期的学人们在文献研究方面都成绩斐然。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张森楷先生对二十四史的校勘，尤其是对《史记》的校注；伍非百先生对诸子文献中名家文献的研究；刘咸炘先生对历史文献目录学的探讨；徐中舒、闻宥二先生对出土文献的研究等等，都享誉全国，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成果有的至今为学界广泛征引。五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四川大学的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获得了更加长足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稳定的学术队伍。由徐中舒先生创办的历史系古文字教研室及由教育部批准成立（1983年）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使以前处于分散状态的历史文献研究有了稳定的学术机构和队伍。目前有教授（研究员）8人，副教授（副研究员）7人，讲师（助理研究员）1人，其中有多位是正活跃于学术界的四川大学的中坚力量，在全国有相当的知名度。目前历史文献学已经建设成为省级重点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

二、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稳定的学术队伍的支撑下，四川大学的历史文献研究以项目多、成果富而见称于同行。在整理方面有《甲骨文字典》、《汉语大字典》、《全宋文》、《宋集珍本丛刊》、

《儒藏》等大型成果相继问世；在研究方面，有围绕甲骨文、金文辨认而产生的出土文献研究的大量论著，也有围绕《全宋文》、《宋集珍本丛刊》、《儒藏》编纂整理而形成的有关宋代文献与儒学文献研究方面的众多专论；在理论上，则有《怎样考释古文字》和《古籍整理学》这样的专门论著发表。

三、培养了较多的人才。四川大学历史文献学拥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博士招生专业主要有宋辽金元文献研究、儒学文献研究、汉语古文字学三个方向。硕士招生专业主要有古文字学、宋辽金元文献研究、儒学文献研究、计算机与历史文献处理研究四个方向。在目前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历史文献学专业虽然不可能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那样门庭若市，数量空前，但本专业以学术至上、质量第一为原则，所培养的学生多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有的已经成为该领域的学术骨干。

四川大学已经走过了110年的历史，包括尊经书院时期则有131年的历史。这一百多年来，四川大学学人上承“蜀学”求实创新的传统，治史多从文献入手，在儒学文献、出土文献、宋代文献以及其他重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成就斐然。

儒学文献。如前所述，四川大学的前身尊经书院以及四川大学早期阶段都有着浓厚的儒学研究的传统，出现了廖平、吴之英、黄镛、龚道耕、蒙文通等一批学术大师。廖先生“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兼治群经，尤其是在讨论今古文问题上创获尤多。蒙先生的《古史甄微》、《经学抉原》等名著，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为学人称道。由于政治及学术大环境的影响，儒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四川大学曾一度中衰，但一直薪火相传，不绝如缕，到1997年迎来了再次振兴的契机。1997年古籍所的同仁提出了编纂《儒藏》的设想，开始着手儒学文献调查与搜集，并从编纂《历代学案》、《诸子集成》系列与《易学集

成》入手，开始了《儒藏》的编纂工作。古籍所踏实治学、真抓实干的精神，使《儒藏》于2004年起相继获得了学校与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支持，在几家相争的情况下，领先全国高校，于2005年5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首批成果50册，被学界誉为“千古儒学第一藏”，“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结束了儒学自古无藏的历史”，“是中国文献学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儒藏》首批成果以其上乘的质量和良好的社会影响，使其被评为“十五”211工程标志性成果，并获得地方政府和国际学术同行的支持。秉承蜀学重视经学史、儒学史研究的传统，舒大刚、郭齐、杨世文等人在专经研究史（如《孝经》学史）、儒学思想史（如儒家德治思想、宋代经学变古、朱熹思想）等的研究上，也有所创获，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围绕《儒藏》的编纂，整理与研究双管齐下，组织和完成了“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目前古籍所全体同仁仍在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地进行《儒藏》编纂，他们将对约5000种儒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评点，编纂成约5亿字的大型丛书，从而构筑起儒学文献的巍峨大厦。

出土文献。这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对甲骨文、金文的整理与研究，其代表人物为徐中舒先生。徐先生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学路宽广，在先秦史、考古学、民族学、四川地方史等方面都造诣颇高，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于徐先生的开创之功，使四川大学一度成为甲骨文、金文研究的重镇。徐先生治甲骨文的主要成果有《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周原甲骨初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1982年）、《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等。《甲骨文字典》广泛吸收了甲骨学界的研究成果，又融入徐先生本人数十年研究的学术心得，体例

独创，释义精辟，举例恰当^①。在金文研究方面，徐先生的代表作《金文诂辞释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对〈金文编〉的几点意见》、《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中山三器释文及官堂图说明》（与伍仕谦合撰，《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殷周金文集录》（四川辞书出版社，1984年）等，其成果至今为学界广泛征引。除具体研究甲骨文、金文外，徐先生还重视二者考释方法的总结，晚年写成《怎样考释古文字》一文，系统地介绍了他毕生治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总结出来的科学方法。承先生学风，其后学伍仕谦、常正光、方述鑫、何靖、彭裕商等人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也成绩卓著，有《殷墟卜辞断代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甲骨文金文字典》（巴蜀书社，1993年）、《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等专著相继问世，众多学术论文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除甲骨文、金文研究外，四川大学在出土的帛书（如《黄帝四经》）、竹简（如《文子》）、石刻等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川大学人将甲骨、金文研究的经验和心得，与传统的小学、辞书编纂学等结合，团结川、鄂两省的学术力量，苦干十年，承担并完成了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建设工程《汉语大字典》（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年）的编纂，在中国文字学史、辞典编纂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① 参彭裕商《徐中舒先生在古文字学上的贡献》，《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3期。

宋代文献。对宋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四川大学在文献研究方面的又一重大贡献。1985年起,古籍所承担全国高校古委会“七五”、“八五”重点项目《全宋文》的编纂,历经20多年的风风雨雨,今年6月这部约1亿字的迄今我国最大的断代文章总集、360册的《全宋文》正式与世人见面,为宋代文化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在《全宋文》编纂的大力推动下,古籍所的曾枣庄、刘琳、李文泽、郭齐、舒大刚、李国玲、王蓉贵、王智勇、黄锦君、吴洪泽、尹波、杨世文等人在宋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系列成果,如《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朱熹诗词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2001年)、《宋人年谱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其中《三苏全书》除涵容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经、史、子、集的各类著作外,还广辑宋代以降名家点评,为三苏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宋人年谱丛刊》则汇集了两宋三百年间宋编宋人年谱33种,元明清以及今人所编的宋人年谱130余种,是宋人年谱的集大成者,为宋代文化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之书。《宋集珍本丛刊》108册,这部目前最大的断代文集珍稀版本丛书,是利用《全宋文》编纂时搜集的原始资料,经过考订研究,扫描影印而成,内有宋元刻本60多种,明清钞本近200种,不少为稀见难得之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该所还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哈佛大学联合,整理和研制了网络版《宋会要辑稿》。该网络版共约1500万字,繁体重排,精加标点、校勘,为此书的第一个新式整理本。此外,该所编纂和出版的一批工具书和资料书,也颇受学人关注。《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四川大

学出版社, 1994年)、《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巴蜀书社, 1995年)、《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7年)、《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续编》(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2年)、《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年)、《宋僧录》(线装书局, 2001年)、《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 2004年)等, 对推动宋代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与整理相对应, 在研究方面也是硕果累累。旨在讨论宋代文化的《宋代文化研究》已出版14辑, 在海内外颇具影响。学术专著《朱熹新考》(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4年)、《南宋吴氏家族的灭亡》(巴蜀书社, 1995年)、《两宋御史中丞考》(巴蜀书社, 1995年)、《唐宋文学研究》(巴蜀书社, 1999年)、《三苏研究》(巴蜀书社, 1999年)、《宋代语言研究》(线装书局, 2001年)、《苏轼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年)等均为上乘之作。至于该所同仁就宋代文化的研究在海内外各种刊物上发表的大量论文, 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其他文献。其他文献的研究主要在张森楷、龚道耕、谭英华等人对正史的考辨上。张森楷先生一生著述颇丰, 用力最大的为《二十四史校勘记》、《通史人表》、《史记新校注》, 其《二十四史校勘记》为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广泛征引。龚道耕先生以治经学为长, 但他的《旧唐书札迻》, 亦多为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引用。谭英华先生的《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 亦为学界所重。伍非百先生的《中国古名家言》对名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古籍所《诸子集成》系列(补编10册、续编20册、新编10册)对诸子文献的整理, 使四川大学在诸子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还有以缪钺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 在魏晋南北朝文献的研究方面, 也产生了诸如《三国志校

注》、《北朝会要》等重大成果，为学界所称道。缪文远先生平生从事战国文献研究，出版有《战国策系年考辨》（中华书局，1984）、《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87）、《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等专著，也在全国学界有重大影响。

总之，100多年来，四川大学在历史文献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上只能略陈大概，不能一一详列。从上面所述可知，四川大学的历史文献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以整理带研究，以研究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四川大学历史学长足进步。特别是诸如《汉语大字典》、《全宋文》、《儒藏》等大部头著作的编纂出版，对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鉴于四川大学在历史文献研究方面的成就与特色，本书所收论文亦分为儒学文献研究、出土文献研究、宋代文献研究、其他文献研究四个大的部分，每部分又按作者的年龄排序。由于编排体例及篇幅限制的关系，本书所收论文或许不能尽如人意，其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张尚英执笔）

编者

2006年7月